

第五代学人丛书

主 编：杨匡汉 白 烨

陈 晓 明 著

无望

的叛逆

从现代主义到后——后结构主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无望

的叛逆

陈晓明 著

从现代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望的叛逆：从现代主义到后—后结构主义/陈晓明
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

(第五代学人丛书/杨匡汉，白烨主编)

ISBN 7-5419-8399-3

I. 无... II. 陈... III. 文学流派—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528 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 18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25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8.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当代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不仅是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涌现与崛起，还在于在研究方法及治学观念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更新。文学研究较之以往，紧贴政治的视角在逐步淡化，一统不变的观念也在变更，文学研究工作者都在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



第五代学人丛书

主编：杨匡汉 白桦

策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总 序

20 世纪对于中国社会的演进至关重要,20 世纪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举足轻重。“5·4”、“1949”、“1976”、“1997”,这些数字已不简单的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包孕的历史内涵,所负载的时代情绪,已深深地印于人们的心海,铭入史碑的记载。在这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中国文学,也自然充满了大悲大喜的歌哭和大开大阖的曲折。而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一员,文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一切更有着身临其境的体验和百感交集的体味,在身经和心历两个方面都与其研究对象——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密不可分。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造就了自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它在本世纪的最晚近的成果,可能就是造就了自己的“第五代”文化人。按照时下人们关于“代”别的看法,“第五代”约出生于 50 年代,成长于 80 年代,活跃于 90 年代。其在不同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已作为中间力量挑起事业的大梁。这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第五代学人”,有承继前几代学人治学传统的一面,但更有结合新的文学现实在兼收并蓄中铸造自己个性的一面。概括起来看,这主要是,选取问题比较注意人们不易觉察的盲点或众人纷说不一的难点;阐发问题常能有人所少思,人所未见;论文说理带有注重学理的明显特点。

当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不仅是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涌现与崛起,还在于在研究方法及治学观念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更新。文学研究较之以往,

紧贴政治的视角在逐步淡化,一统不变的观念也在更变,文学研究工作者都在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涅槃”,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而这其中,由年轻的“第五代学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讲究学术本位和学理个性的追求,则更为豁人耳目。汇集于“第五代学人丛书”第一批的8位作者和8种著作,可以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从而充分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五代学人”的已有风采和发展势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近年来吸纳了不少文学研究新人,其中“第五代学人”已开始在当代文学研究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展示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和加强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我们组编了这套以新选题、新思路、新见解为主的“第五代学人丛书”,望能藉以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的趋向,壮大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生力量,同时也为回眸世纪文学之路留下一代人忧深思远的理论思考。

杨匡汉 白烨

2002年4月6日,北京

序 言

本书取名《从现代主义到后——后结构主义》，似乎有生硬之感。就理论术语的对称来说，应该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或者以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称。因为前者通常是就文学艺术思潮而言，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哲学流派。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 80 年代后期也倾向于开放性，并且趋于广义。而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可用以指称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之后的哲学流派。在我的理论设想中，现代主义被看成一种现代的艺术思潮，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文化思潮。同样，后结构主义在我的理解中，也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流派，特别是在 90 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推动下，它更具有文化思潮的特征。当然，说到底，把这两个术语连接在一起，是想表明我个人这些年经历的思想变迁，同时也以此来表现当代理论某个侧面运行的轨迹。

文学的现代主义追求一直构成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的根本动力。80 年代中国文学关于艺术创新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现代主义的想象。只要想一想“朦胧诗”一直被称之为“现代诗”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事实上，80 年代的一切文学创新都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最早的创新之举“意识流”小说，就是因为打上了“现代派”的印记而蒙受各种非难，同时也因此而被看成文学创新的实质性进步。1985 年，中国文坛有两股思潮，其一是“寻根文学”，其二是“现代派”。但

这二者都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最新成果。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韩少功的《爸爸爸》，虽然与传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但引起评论家注意的是它所包含的现代主义思想和美学特征。在另一方面，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文坛引起的反响，与其说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在艺术方面的大胆令人振奋，不如说是人们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过于渴求。这两篇小说使人们开始有理由认为，中国总算有了真正的“现代派”。因为这一次取得的成果不只是像意识流小说那种形式仿制的二手货，而是从观念到形式，从精神到技巧，都充满着现代主义的蕴含，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现代主义气息。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叛逆，又一次名副其实的进步，在大多数追求文学创新的人们看来，它足以标志中国当代文学跃进到与西方现代主义同步的高度。

实际上，“进步”这一概念在 80 年代思想界的反映，就与西方现代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这种观念还可以上溯至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启蒙主义理想。自从西学输入中国，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就把西方作为中国进步的参照系。“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中国进步的意义指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指导下，中国关于自身“强盛”的想象也没有越出“超英赶美”的范围。在反西方帝国主义的口号背后，是急切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程度的渴望心理。事实上，这种心理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只是这种心理被扭曲之后，显得怪戾乖张而自相矛盾。问题依然出在“民族—国家”认同危机这个大前提上。第三世界国家并不仅仅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文明方面，同时也在人文文化方面必然与西方构成对话。伴随着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第三世界也在着手创建民族—

国家。这二者构成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充满了紧张持续的张力。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到，要进入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但另一方面，又设想可以保持住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统治阶级想保持住集权统治）。大多数第三世界都设想在中央集权政府的领导下进入现代化，但现代化在文化上又不可避免与传统的思想专制产生冲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技长”，“以夷制夷”，与其说是隐藏着与西方对抗的潜在心理，不如说保持住传统的权力结构更为重要。然而，现代性的压力又始终在第三世界文化内部产生变革的力量。尽管统治阶级对待现代性持双重标准，但文化和思想的变革力量，却并不顾及政治权力的保守力量。正如近现代中国，一旦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新文化运动就变得势不可挡。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争论，与前此的洋务运动中出现的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封建王权的前提下来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而后者则完全是在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上，来表明知识精英的文化选择。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文化上的自主意识，关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限制的范围。

但文化启蒙意识很快为中国面临的“民族—国家”危机所分离，这使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单纯从文化意义上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价值选择。四五十年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意义完全压倒了它的文化意义，而知识分子普遍被卷进革命这一事实，也使得知识分子精英再度以权力为轴心去考虑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非常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下的文化本土化危机问题。从

理论上来说,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反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明显与西方现代性历史相关联,但它又设想,它是超越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东方中国的独特的“民族—国家”。而它在文化上的身份也含混不清),这种民族—国家无疑在政体的组织结构形式方面脱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模式。它既不能直接从中国传统社会中找到思想价值体系,又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里找到依据。只有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才解决了这一矛盾。这样,中国既可以在形式上具有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又可以找到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借口(例如五六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策略)。中国从其历史实践的本质上来说,试图走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道路。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现代主义何以构成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新的理想化目标。“文革”后的文学被命名为“新时期”文学,其基本内涵是指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反“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在反省“文革”的思想趋向中,“新时期”文学找到了历史起点。所谓“伤痕文学”就是“新时期”的首要成果。但思想解放的政治纲领就是实现“现代化”,文学当然要服从这个时代需要。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正是文学沿着思想解放运动轨迹向现实领域演化的结果。80 年代初期,“现代化”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共同想象关系,凝聚了社会的内驱力。实现现代化的急切想象,使中国社会再次拉近了与西方的距离,传统与现代之争,再次以中国/西方之争的面目出现。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反传统”(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的冲突。而实际上,“反传统”不过是改革现实的借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把西方现代文明看成

中国当代改革的参照系。摆脱贫穷落后,解决现实难题,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有必要借鉴西方的思想文化成果。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借助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展开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工程,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启蒙沿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方向前行,其中经历的坎坷当不难想象。在某些方面,现代中国设想的那种启蒙无疑被打断,直到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才又被重新修复。“人道主义”、“人性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以及异化与“主体性”等问题,可以看成是初步修复的结果。如果说,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本质上还是与主导意识形态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一致,或者说是从这一主导意识形态设定的反“文革”主题中派生出来的,那么,这些来自西方19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进一步推演的结果,则是引进西方现代思潮,这就明显偏离了主导意识形态给定的范围。

但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政治轴心或意识形态派别利益的立场出发,去把握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潮。对于后起的知识分子来说,求知的欲念是他们汲取西方现代思潮的直接动力。至于一种知识总是反射出一种观念形态的力量,那又当别论。年轻一代的学子崇尚西方现代思潮,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成果。大批硕士研究生和少部分博士研究生步入中国学界,这使西方最新的思想成果进入中国学界成为不可避免。追逐新知识,是那个时期写作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时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生大部分人的选题与西方现代思想有关,这使西方晚近的思想成就迅速在学界传播。这并不难理解。在8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是全方位

位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愿望理所当然扩散到思想文化领域，其标志当然就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借鉴。而思想现代化的最鲜明和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的掌握。

在文学创作领域，同样是惟西方现代派马首是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中国当化文学的主导美学规范——现实主义就来自西方，不管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艺术高度早已为西方或俄苏文学传统所给定。尽管社会主义文化话语在中国的胜利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所确认的美学规则，并未超出西方和俄苏的前提，只不过现实主义那套美学规范已经被默认，看上去是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而已。而那些对西方晚近的艺术成就的借鉴与学习则被看成是舶来品。在崇尚西学蔚然成风的时期，这种指责不构成多大威胁，但在反西方文化霸权回归传统本位占上风时期，这类非难则理直气壮。这种非难忘记了中国现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与西方的内在联系。中国可以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保持中国本土特色，但在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教育体制方面，很难根本悖离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创立的知识构型和准则。在文学艺术和美学规则方面同样如此。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的那些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主导文艺的最高规范一样，西方现代主义创建的新的一套美学体系，被当做 80 年代中国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的依据。这一点并不是说中国在文化上就成为西方的附庸。

这种说法似乎令人悲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东方大国好像是被西方现代性工程拖进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如果顽强偏执地用东方（中国）/西方来看待第三世界在 20 世纪的命运，完全可能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但是换一种眼光来看这

一问题,就会有根本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把“现代性”这样一项思想工程,看成是人类在近代以来展开的一项宏伟工程,而不是偏执于东方/西方的分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不管是早期的现代性启蒙理想,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无疑都是西方设计出来的东西。但我们同时要看到,西方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也经历着传统到现代的阵痛。这场历史变动由西方逐步向东方扩展,西方扮演了强者的角色。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也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史,给广大前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造成极大的创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化”毕竟表明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人类由此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力量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抗衡。现代化使人类的能力产生飞跃,使人类的文明迅速跃进到一个极端的高度(至于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当别论)。对于人类来说,现代化是其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西方率先走上这条道路,前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否则就很难在人类这个共同体中生存下去。“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一度成为人类普遍的生存信念,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文明进步”的形式展开的。对于那些前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不进入这个世界体系,就意味着落后,就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西方率先走上“现代化”这条道路,处于优势;东方前现代国家几乎是被迫走上这条道路,当然显得被动而处于劣势。但这不等于东方国家有理由和有能力逃避这条规律。情感上的敌视不能替代历史的选择,东方国家必然要经历现代化,并且要尽可能弥补错失的机遇,否则其生存竞争能力只能长期处于弱势。

由此看来,由西方创立的现代性的思想启蒙工程,或是资

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未尝不可以放大为人类近代历史的必要选择；接受现代化的规则，接受现代化的知识，未必就是屈从于西方文化霸权。因为西方本身也经历了这一历史变动，东方（中国）的落后不过是时间上的错位而已，弥合这一错位的惟一办法就是不再人为地设置障碍，而是直接不带偏见地重建中国的现代知识构型，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的规范法则。因此，我对“回归民族本位”这种说法从来持怀疑态度。尽管我对从事国学研究的同行表示高度尊重，但我不认为“国学研究”具有优先性，所谓“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是经不住推敲的。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大师无不强调“汇通古今”、“汇通中西”就是明证。除了极为有限的领域可以保持所谓“中国传统本色”，在关于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方面，很难设想不与西方理论知识发生对话关系。正是这种对话关系，使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生深刻的变化。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质疑，也有人怀疑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但我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国不可能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之外，正是这种全球化的跨文化融合，使得中国文化在经受挑战中，重新构建自身而显示出新的生命力。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80年代一批莘莘学子何以崇尚西学，追逐现代主义思潮，以此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内在动力。坦白地说，我本人对西方现代以来的理论知识有强烈的兴趣。我想这是求知的天性在推动我这样做。回顾我不算太短的学术历程，确实是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陶冶下成长起来的。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进入大学的学生，求知若渴。数年的知青经历，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这对于并非“红五类”的我来说，在那个年代无异于痴心妄想。粉碎“四人帮”给我们这类人带来机

遇,可想而知,我们这代人对于新知识是怀着怎样的热情。80年代是一个求知的年代,人们崇尚新思想,到处访朋拜友,争论不休,到处是讲座和讨论。那个时期有思想的人就像现在有钱的人一样备受人们尊敬。当然,也不乏思想的恶性膨胀。随着个性解放的神话深入人心,人们创制新思想的胆略也在加强。新名词新术语开始不胫而走,铁青着脸的年青人的口袋里,很可能装着一个庞大的、变更历史与现实的思想体系。不管如何,我怀念那个时期。也只有在那种思想氛围里,我们对刚刚涌进的西方思想带有巨大的热情。我本人的学术基础得益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康德、黑格尔耗去了我早年大部分的精力。中文系出身,却对西方哲学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这可能与 I 较早选择文学理论为学习方向有关,同时也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哲学确有密切关系。不能想象,要进入文学理论领域,不打下西方哲学的基础能有所作为。但我本人似乎矫枉过正,过分着迷于西方哲学,这使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轻视文学这门学科。在我啃西方哲学史时,我的文学同行(文学同代人)已经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小试牛刀,并且迅速名噪文坛。但我一直不为所动。在硕士毕业后的数年,我的职业是在南方某研究所从事哲学研究。如果不是生活发生了某些变故,这一段可以看成是我最愉快的工作时期。80年代中期,我曾以有关哲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文而被一些人物和同行注意。我终究还是以文学为专业,并且还是以自己曾经颇不以为然的文学批评为谋生的手段,这一直使我觉得我是在降价处理自己。沉寂数年,使我深刻领会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市场法则。痛恨一种法则的惟一办法,就是去战胜这一法则,而战胜也就是实践,其结果终究还是臣服于这种法则。终于不甘寂寞,这是我跻身当代

批评界的直接缘由。多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经历过一批青年批评家的努力，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已不再是意识形态简单的应声虫，而变成一项更具有知识水准和更严格的专业训练的智力活动。回顾我的学术经历，并不是要表明我有多么深厚的学术基础，只是想勾画那个时期的学术风气。尽管我走得有些过头，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个时期崇尚西学的普遍倾向。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当我选择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汇集成册时，它所表现的正好是当代理论思想所走过的历史行程。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到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再到结构主义，最终走向后结构主义——这也就是当代理论追寻西方最新理论动向走过的路程。客观地说，也只有我和少部分同行会承认这样一种历史变迁的轨迹；在大多数同行，乃至我的同代人那里，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变动，并不以为然。但我个人却看重这一最后的变动，这并不是我参与其中而抬高一些微不足道的变化，而是我从这最后的变动看到了当代理论的必然行程，和由此产生的实际影响并预示新的理论前景。

当代思想界出现后现代主义动向，虽然主要动因乃是一小部分青年学人追逐新知识的结果，但也有中国文化语境本身的依据。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起源于80年代后期。虽然早些时候有一些关于后现代的介绍，但后现代作为一种理论现象，当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中国文坛引起反响。后现代的兴起，当然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式微。确实，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中并未扎下根。它之所以半途而废，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喜新厌旧；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主义寻求的那种超越性的永恒性观念，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并不协调。现代